



诞生于垦牧校的抗大九分校

□陶建明

“黄海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担承……”1942年春,一群穿着新四军军装、唱着校歌的青年人出现在黄海之滨的海门县海复镇,入驻张謇状元创办的垦牧校,这里从此成为了培养新四军军政干部的摇篮——抗大九分校。

上图:垦牧校旧址,下图左起:抗大九分校校舍,抗大九分校旧址外景,抗大九分校在海上坚持学习和斗争。



粟裕率一师东移海启

1941年12月,日军加紧对大江南北的控制与掠夺,苏中新四军一师驻地东台三仓地区面临三面日军重兵围剿、一面临海的态势。苏中党政军及后勤单位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关键时刻,粟裕果断作出一师海上东移海启的决定。为做好战略转移,粟裕先前部署一师三旅陶勇率部东进海启,开展游击斗争,建立敌后根据地,策应大部队的开进。1941年1月,一师率随师部机关租用18只渔船在琼港上船,从海路向海启转移。经过20多天的海上与敌周旋,于1942年2月22日,抵达吕四彭家套上岸,与先期到达的一师三旅会合。

粟裕来到海启后,日伪军闻讯尾随进犯,对海启进行“扫荡”。粟裕组织官兵对来犯日伪军进行狠狠打击,并在日伪军占领吕四镇后,派出部队进行抵抗性打击,迫使日伪军退出吕四镇、缩回海门四甲镇。粉碎此次日伪军“扫荡”后,粟裕率师部移驻海门县海复镇,将师部设在海复镇通海垦牧公司。

抗大九分校成立

随一师来海启的还有一师的教导队——抗大苏中大队。

抗大苏中大队是1941年9月新四军盐城抗大五分校的部分干部,奉军部命令,与新四军一师苏中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合并而成立的。抗大苏中大队到达垦牧公司后,由于当时海启战事较少,有一个稍微安定的环境,并且靠近一师师部,有开展教学的良好机遇。于是,粟裕着手对抗大苏中大队进行改造,将校址设在海复镇的垦牧校。

垦牧校是张謇于1920年筹建的南通师范附属垦牧乡高等小学校(简称垦牧校),拥有校舍113间,是当时苏北规模最大的乡村学校。1938年,南通城沦陷后,通州师范迁至垦牧校的四合院,又称“通师侨校”。

1942年3月,抗大苏中大队第一期招收学员千余名,在垦牧公司举行开学典礼。5月,新四军一师根据华中局的决定,将抗大苏中大队正式改为抗大九分校,粟裕师长亲自担任校长,刘季平担任副校长,张日清担任教育长,谢云晖担任政治部主任。学校设军事队、政治队、参谋训练队、青年学生队、地方武装队、电台训练队、会计培训队等7个队,另附设一个医务干部训练队,全校教职员共600余人。全校以抗大相关大队为骨

干,吸收从上海、苏南、苏北各地来的爱国青年学生、工人和从部队、地方抽调来学习的学员。

理论与实际并重

抗大九分校坚持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理论与实际并重,军事与政治并重和少而精”的教育方针,坚持教学与革命斗争相结合,对学员集中进行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着力培养军政兼备、素质全面的学员。

军事教育包括理论课和战术课。理论课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战术课以进攻战、游击战、夜战为重点。军事教育的野外演习时间多于课堂讲授时间,每月有若干次紧急集合,日常行军中进行通信联络、连疏开、夜袭等演习。教学上采取课堂上研究情况、自由讨论、最后总结的方法。有时召开战斗回忆晚会,总结实战经验。教育侧重点是游击战、夜战和刺杀。因子弹不多,靠近吃肉搏拼刺刀,天不亮就集合学员起床全副武装跑步、练刺杀。

政治教育以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为主课,帮助学员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特点以及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目的。党的基本政策教育重点是解决对党的政策上的模糊观点和错误认识,提高政策水平。校部还经常集中全校人员,由师首长和校领导作时事报告,进行形势教育,展开讨论,增强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教学方法上采取课堂讨论和课后辅导制度,提倡独立思考、发扬民主。课堂上允许质疑,讨论中鼓励争论,因而思想活跃。

文化教育以语文课为主,算术课其次。对不识字和识字很少的进行扫盲;对初小水平的进行语文、算术、自然、历史等教育;对少数文化稍高的进行阅读、写作指导等。九分校绝大部分学员是工农干部,学文化是他们的共同愿望,他们迫切要求不仅在政治上翻身,在文化上也要翻身。九分校用50%、最多时达80%的教学时间进行文化教育。在流动的情况下,学员们把门板当黑板、背包当凳子,双膝是课桌;上课时全副武装,战斗打响了,还在上课的学员背起背包扛起枪,跑步上战场。他们勤奋学文化,白天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晚上在暗淡的油灯下学。行军时背包后面插上硬纸板做成的字牌供后面的同志识字,休息时用树枝在地上划着练字。经

过抗大九分校学习的工农干部,初步掌握了文字工具和一些基础知识,获得了学习军事、政治和专业知识的钥匙。

一面战斗,一面学习

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用战斗保卫学习,这是抗大九分校办学的最基本的特色。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抗大九分校一直处于频繁战斗、高度流动的状态,学员们一手拿枪、一手拿书,一面行军战斗,一面坚持学习。当日伪大举“扫荡”的时候,学校主要是行军作战,但也不放松学习,利用有利时机学习;当“扫荡”间隙或情况比较稳定时,主要进行教学,但也不放松日常的战备工作。在日伪军大规模扫荡的情况下,抗大学生白天上课、晚上根据情况展开行动,和军民并肩冲锋在抗战第一线。

1942年5月底,盘踞在启东吴仓港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范巧林部,和日汪勾结一起。他们不打鬼子,专搞反共摩擦,破坏抗战,欺压百姓,民愤极大。粟裕决定除掉这个祸患。当时粟裕身边只有3个连,兵力不足,特派抗大九分校三中队参战。6月3日晚,抗大三中队袭击汇龙镇伪军成功后,又冒雨奔袭吴仓港范部,在其他7个连队的配合下,经过40分钟的激烈战斗,生俘范巧林部200余人,缴获敌人电台一部和全部枪支弹药。这一仗为开辟启东东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出操、跑步、站岗、放哨、到上课、打靶、投弹、急行军,学员实行严格的军事生活,练就一身虎气。学校实行“学习集体化、生活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枪不离身,一切行动听指挥。他们铺着稻草统一睡地铺;一个排一缸玉米饭,听哨声统一开饭,规定吃饭时间,吃稀饭8分钟、吃干饭6分钟,听到哨音立即集合。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大家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在艰苦环境中磨炼意志,在抗日实战中练就本领,抗大九分校为根据地源源不断输送各类抗战人才。一时间苏北成为抗日青年向往的“圣地”,不少有志青年克服种种困难,千里迢迢来到海复镇,加入抗大九分校的行列。

传播真理,宣传抗日

抗大九分校在海复镇期间,通过多种形式与通师侨校、垦牧校的师生联合举行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传播真理,宣传抗日,密切了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的

关系,显示了人民军队的士气与力量,给广大民众莫大的鼓舞。

“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一师师部在通师侨校操场举行盛大阅兵式,粟裕登台检阅并作了重要讲话。抗大九分校和特务营在操场上举行阅兵式、团体操表演和刺杀比赛,为全体师生和当地群众表演。表演时学校附近的大路上都挤满观众。规则的队伍、整齐的步伐显示强大的军威,坚定了广大群众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信心。

“五四”青年节那天,通师侨校学生在一师师部和抗大九分校的帮助下,举办运动会。参加者还有战地中学、能(仁)海(门)联中等校师生。运动会上举行了游泳、篮球、田径等项目比赛。粟裕师长亲自参观运动会,并为获奖的同学颁奖。

当天晚上,新四军一师师部与启海行署在垦牧公司广场举行盛大的“五四”青年节纪念大会。参加活动的有抗大九分校、通师侨校等驻地附近的教师和学生。粟裕在2000人的群众大会上,作《认清形势、团结抗战》的报告,会后大家一起观看一师三旅服务团演出的《大红灯》等宣传抗日救亡的节目。

转移海上,北上办学

1942年6月15日,日伪军3500余人分九路“清剿”我苏中四分区,形势十分严峻,抗大九分校奉命突破封锁线,撤离启东。全体师生从吕四港附近的三甲镇入海乘船北上。在海上生活时,集中上课已不可能,主要以分散自学为主,教员分散下队,组织分组讨论和辅导,生活十分艰苦,淡水吃完,用海水拌的燕麦炒面,难以下咽。经过十多天海上漂泊,师生向琼港转移。

抗大九分校离开海启后,辗转于新四军一师苏中的一、二、三、四分区和三师的盐垦区以及六师的苏南地区,二师的淮南地区、四师的淮北地区,在极其艰苦残酷的条件下,在激烈复杂的斗争中,一面学习,一面战斗,为革命培训了3000余名干部,这批干部大多数成为抗战时期的栋梁之材,为夺取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大九分校虽在海启只办了三个月,但为革命培育了红色基因,为抗战输送了干部队伍。海复镇也因此成为红色摇篮的发祥地,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使这个滨海小镇为更多人所知。

了从他嘴里了解我地下党员的名单及我方重要情报,敌人对他采取了种种残酷刑罚,但一句有用的信息也没有得到;他们又找来周富元的三姨娘劝说,周富元仍然坚决拒绝投敌。最终在正月十七(2月7日),周富元被敌人残忍杀害,牺牲时,年仅34岁。

在周富元牺牲后的1947年2月19日晚,苏中行政公署一分区特务团及周边如皋、泰兴县团,发动了著名的“周庄头战斗”,经过一夜激战,摧毁13个碉堡,击毙敌自卫队、还乡团多人,救出被捕干部群众100多人。周庄头战斗是华中野战军北撤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对抗进攻,也是在反“清剿”期间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如皋军民坚持敌后斗争的勇气,如西地区坚持斗争的局面大为好转。

周富元牺牲后,是一位名叫周贵相的族人推着车去周庄头据点收的尸体。遗体拉回来后就埋在了周家菜园后头。

老建筑

“一门两院士”的石庄闵氏故居

□侯求学

古镇石庄有一条南北走向的三里长街,东西走向的龙游河段横穿镇区中心,将大街分为两段:河南为南大街,河北为北大街。北大街东侧有一条何家巷,沿着此巷前行不到50米,就到何家巷12号——闵氏故居。

石庄闵氏,“祖籍徽州,清咸丰年间因避兵乱来石庄定居”(《石庄志·卷二十一·人物·闵乃大》)。历经数代苦心经营,闵氏逐渐成为石庄有名的大户。石庄北大街北片大多数店铺、房屋都为闵家所有。

石庄闵氏故居因一門两院士——闵乃大、闵乃本而出名,又因闵开三追随张謇、沙元炳参与兴办新学和实业,给后人留下启示。闵氏故居原“为闵乃大、闵乃本堂兄弟祖屋”(《石庄志·卷十七·文化体育·闵院士故居》)。闵乃大被尊为“中国电子计算机之父”,闵乃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

石庄闵氏故居建于晚清,总面积约516平方米,分列于何家巷南北两侧,已经修葺8间:南北两侧各4间,分别连成一体,均为青砖灰瓦、灰缝白墙的小尖顶平房。屋脊中间是具有装饰作用的小型扇面白石灰,两头平直翘起。滴水檐位于三角形的“福”字瓦之间。大门由8块长方形门板组成,两边各有3块木板是固定的,中间两块木板为可活动的对开门扇。每间屋之间的外墙垛和两头山墙,均用小青砖白灰砌成。屋内各室之间由小青砖砌成的单墙相隔。虽然每间屋都有门直接对外,但在内隔墙上都留有小门相通。尖顶屋面内侧除最高处的正梁外,南北坡面各有横梁2根、木椽3处,油黑色旺砖架于木椽之上,在旺砖之上铺以灰色小瓦。屋梁有木柱承接,直达地面,并嵌于隔墙之中。北侧房屋为闵乃本出生地,南侧房屋原为闵乃大家所有,现为族弟闵乃英居住。

清末民初,闵开三在沙元炳支持下,出资创建“石庄第一高等小学”,占用回龙庵庙宇,引来当地人不满,闵开三不得不“携家眷投奔在广生油厂主持厂务的沙元炳。沙通过张謇为其在唐家闸河东购地建房,以重操旧业立证”(《工业遗产的瑰宝——唐家闸·闵家宅楼与大院》)。闵氏遂在唐家闸河东街上开辟了第一家商号——闵家杂货店。闵开三之子——留学美国的闵钟辉,回国继承家业,创办了和丰油坊,并继而兴办了唐家闸首家私人银行——汇通银行,逐渐发展成为近代唐家闸的商界名流。

汇通银行、和丰油坊在闵氏杂货老店基础上不断加盖形成唐家闸的标志性建筑之一——闵家大院,如今修缮,保存完好。石庄闵氏故居与唐家闸闵家大院,遥相辉映,成为长江下游北岸一对耀眼古建。



农用拖拉机越来越少

□任寿

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一首蒋大为演唱的《拖拉机手之歌》很流行。歌词是:“铁牛唱啊马达吼,翻花的土地黑黝黝,要问开车的是哪一个?我是公社的拖拉机手。操纵杆握在手,意气风发精神抖。肥田沃土我开垦,荒山美景亲手绣。胸怀壮志学大寨,改天换地争上游。拖拉机手心欢畅,年年歌唱大丰收。铁牛唱啊马达吼,我开足马力朝前走,要问我力量哪里来,红太阳光辉照心头。”歌词通过描绘拖拉机手的辛勤劳动和对公社美景的创造,展现了他们的自豪感和成就感。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南通地区农业机械发展和全国各地一样速度较快,大中型拖拉机以国产丰收35、东风50、铁牛55轮式机型为主,手扶拖拉机以东风12型为主,柴油机以195系列为主。1978年底,全地区农业机械总动力为77.32万千瓦(市郊区2.13万千瓦)。8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农业机械投资经营逐步以个体为主。既可农用、又可运输的东风12型手扶拖拉机大受百姓欢迎,大中型拖拉机逐年减少。1987年底,南通市农业机械总动力为147.79万千瓦(市郊区4.84万千瓦)。东风12型手扶拖拉机,农忙时从事农田作业,农闲时装上拖箱即可从事运输工作,农民建房所需建筑材料大多由拖拉机运送上门。为解除拖拉机手驾驶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的后顾之忧,1983年,南通市观音山乡试办了“农机安全互助保险基金会”,动员持有农用拖拉机驾驶证、操作证的农机人员自愿参加,并订立《互助基金会条例》,规定入会者年交互助基金20至40元。次年,全市以乡镇为单位的农机安全互助保险基金会发展到75个。与此同时,相关机构也开办了手扶拖拉机第三者责任保险,每辆拖拉机交付保险费70元。1985年海安县有手扶拖拉机4000多辆,其中单纯从事农田作业的800多辆,其余的都是农田作业及运输两用拖拉机,还有少量的方向盘式拖拉机。同期,如皋县、如东县、南通县有手扶拖拉机5000多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手扶拖拉机、方向盘式拖拉机发展的高峰期,北三县每个县的拥有量均在8000辆以上。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近年来,农用运输拖拉机越来越少了。究其原因,一是过去农田作业使用的拖拉机逐步被新型的播种机械、收割机械所代替;二是随着农村建房量的减少,拖拉机跑运输的也越来越少了。除了这两个原因,还有以下几个因素:

1.农民进城打工,种地的人减少,对小型拖拉机需求减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导致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减少,对小型拖拉机的需求也随之减少。

2.大型农机需求量上升。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的出现,使得大面积种植成为趋势,对新型三麦播种机械、插秧机械、植保机械、收割机械等大型农具的需求逐年上升。小型拖拉机难以满足大面积耕作的需求,逐渐被淘汰。

3.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影响。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农机购买补贴政策,鼓励农民购买大型专业农机。由于拖拉机属于小型农机,结构简单、功率小(一般都以12匹为主),难以获得高额补贴,因此逐渐被大型农机取代。

4.经济因素。全球经济下行导致国内出口受阻,消费不振,投资乏力,农具行业也受到影响。同时,粮食价格长期低位,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导致对农具的投入意愿不强。

5.市场竞争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农具行业同质化竞争严重,产能过剩,价格战频发,企业利润下滑,售后服务跟不上。此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如购置补贴额度的下调、补贴政策未完全落地等,也冲击了市场信心。

6.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农业生产成本的持续上升,增加了农民的经营压力,购买力下降,影响了农民对农具的需求和投入。